

白话中国古典精萃文库（卷三十三）

资治通鉴

——
雄伟的书中帝国

（文化普及珍藏版）共192卷

204.3

辽新登字 3 号

资治通鉴——雄伟的书中帝国

zi zhi tong jian——xiong wei de shu zhong di guo

金明庸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91 千字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8.5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任 宁

封面设计:王凌波 胡萍丽 责任校对:冯天宏

ISBN 7-5313-0884-3/I·807

5.70 元

总定价:258.00 元(套)

主 编:王德昌

副 主 编:娄 方 任 宁 陈建辉

编 委:宁湘伟 郭 衍 梁路光
郭鼎文 孙也丁 李慧蕾
青 晓 杨冬伟 尹 杰
杨 青 金春玉 刘 多
王 丹

原著者简介

资治通鉴

作者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宋真宗天禧三年生，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累官端明学士，知永兴军，神宗时，极言青苗助役法之不便，忤王安石，出判西京御史台，归洛，哲宗立，入相，新法之为害者尽改之，卒于官，赠温国公，谥文正。

出版说明

古典著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她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既反映了历史长河中华夏子孙的思想道德观念，也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诸方面的社会生活。

那么，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下去？又如何在浩如烟海、纷繁复杂且文言、古体、生涩又难解的历代经典中得到启迪，受到陶冶，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呢？本书的指导思想就在于为广大读者一解其忧。

本系列丛书以我国历代经典著作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五十二种，它以浅显、生动的白话文体，对每部经典或简或繁地进行了再创作。简者通俗易懂，繁者使原典更加充实。既保持了原典的精神，又对原典进行了再发掘；既有原典的释译，又有作品、作者的介绍及历史背景的讲解，突出其通俗性和故事性；既可使初学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学习古典著作中踏出一条捷径，一步步走向原典；也可专家、学者、省却查阅冗繁原典的时间。它适合于不同年令，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

本丛书以《论语——诗人的圣经》开篇以《镜花缘——镜子里的神话》结束，约千余万言，历时数载。是数十位史学工作者、专家、教授心血的结晶。

古典精萃文库，伴您走上成功之路！

编 者

目 录

司马光小传	(1)
一、司马光的家世与青壮年	(1)
二、新、旧党两巨擘——王安石与司马光	(8)
三、白首执政与著作	(19)
资治通鉴同修者略传	(25)
一、刘攽	(25)
二、刘恕	(27)
三、范祖禹	(31)
资治通鉴编集的意义、结构与工作情况	(38)
一、编集的背景与缘起	(38)
二、编集精神与结构	(40)
三、实际工作的概况	(44)
周纪	(47)
一、三家分晋——通鉴的开始	(47)
二、三家分晋的由来与才德论	(51)
三、秦的崛起与周的灭亡	(56)
秦纪	(62)
一、秦朝统一的要素——客卿	(62)
二、几乎改变历史的一击	(65)
三、秦的灭亡	(72)

汉纪	(79)
一、改变历史的餐会	(79)
二、制礼与叔孙通	(84)
三、外戚政治与王莽篡汉	(88)
四、东汉初期的用人与士风	(96)
五、东汉的宦官外戚	(101)
六、第一次党锢之祸	(107)
七、第二次党锢之祸	(113)
八、大冲突的结局	(121)
魏纪	(131)
一、曹丕篡汉与司马光的正统论	(131)
二、从几段重要谈话看三国发展的趋势	(136)
晋纪	(149)
一、三家归晋	(149)
二、魏晋风气	(156)
三、五胡乱华的背景	(162)
四、由群雄角逐至南北对峙之局	(169)
五、民族的同化融合	(175)
隋纪	(185)
一、最后一次的欺人孤儿寡妇及南北统一	(185)
二、开皇之治	(191)
唐纪	(198)
一、唐初继承问题	(198)
二、武则天的篡位	(207)
三、从开元之治至藩镇之乱	(214)
后周纪	(219)
一、冯道——五代十国的一个典型官僚	(219)

二、陈桥兵变的空白——资治通鉴的结束·····	(224)
附录 原典精选·····	(236)

司马光小传

一、司马光的家世与青壮年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宋真宗天禧三年生，宋陕州夏县涑水乡（在今山西省夏县西）人，他的远祖司马孚，是发动兵变诛除曹爽的司马懿之弟。晋武帝（懿之孙）篡位称帝，封这位叔祖为安平王，对他最加尊礼。降至他的裔孙征东大将军司马阳，因葬于夏县涑水乡，其子孙遂定居于此。

司马光高祖以下，都因五代衰乱而不做官。降至祖父司马炫，始举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十里）知县。父亲司马池，历任御史、知州等官，后至尚书吏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相当于吏部的司长兼天章阁的皇帝侍从）。他家累世以气节见称于乡里，父亲更以清直仁厚及文学行谊见著，号称一时名臣。母亲姓聂氏。

司马光儿童时代即凛然如成人，性格早熟。七岁那年，闻讲左氏春秋，极爱此书，回家为家人讲述，即已了解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以至不知饥渴寒暑。年仅十五岁，书籍无所不通，文词醇深，有西汉文章的风格。小时候，他与一群小朋友游戏，其中一人攀上瓮顶，失足跌落盛有水的瓮缸之中。众儿惊惶逃去，司马光镇静地捡起石头，击破瓮缸，于是瓮内之水迸发而出，救了那人性命。这件事迹，后来被汴京与西京（洛阳）之间的画家们，画以为图。其后，司马池由于

做官，依法得荫任（因先世勋绩而铨叙任官的方式）一子为官，司马光依次应该得到此机会，但他推让再三，让给了堂兄，然后自己受补为极低的斋郎（祭祀时执事之吏，为入仕之资）。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3），由于范仲淹、欧阳修等越职言事，朝廷以朋党警诫百官。这年司马光才二十岁，举进士甲科而升迁为奉礼郎（文教系统的低级散官）。司马池时任杭州知州，所以司马光推辞升官，要求出为签书苏州判官事（助理判官），以便就近侍奉父亲。获朝廷批准后，未上任而母亲逝世；母亲丧服未除，父亲也相继逝世。及至为双亲服丧期满，才出仕做官，不久累升至国子直讲（相当于中央大学讲师），后又除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等职，开始接触修撰历史的工作。

其父的好友庞籍，向以知人称著，见司马光而奇之。及至庞籍升为枢密使（相当行政院付院长兼国防部长），遂一直提拔司马光；当庞籍外调时，也辟用他为通判（高级行政助理官）。司马光感激庞籍的知己，尽力为他工作；甚至他死后，司马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兄弟。当时的人，都称赞他们两人。

仁宗末，累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皇帝侍从兼谏官）。早在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仁宗皇帝生病，皇帝无子，所以天下寒心而不敢为言，只有谏官范镇（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重要助手范祖禹的叔祖）首先发议，司马光（时任并州通判）闻而继之，上疏请求仁宗选择贤良的宗室子弟为皇太子，如果将来仁宗生了儿子，皇太子才换人不迟。司马光为此呈递了三份奏章，又写了一封信鼓励范镇，大意说，这种大事不言则已，言既一出，岂可再收回，希望范

镇以死争之。于是范镇鼓吹益力，终被罢职。司马光在五年以后（嘉祐六年），自己已经成为谏官，遂再度上疏提出问题：“臣从前为并州通判时所上三份奏章，愿陛下能果断而力行！”

仁宗一向寡言沉默，闻言沉思，良久而说：“是不是要选宗室为皇太子的事呀？这是忠臣之言，只是人不敢提罢了！”

“臣建议此事，自谓必死，想不到陛下开诚接纳。”司马光道。

“这有何害，古今都有这种事情啊！”仁宗说。并因而命令司马光把建议通知中书（宰相办公机关）。

“不可，”司马光解释说：“陛下应该自己把此意晓喻给宰相才是啊！”

过了一个月（嘉祐六年九月），司马光又上疏面奏：“臣那天进说，陛下欣然无难，私意以为马上实行了。如今寂无所闻，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春秋鼎盛，子孙会有千亿之多，何必立即做此不祥之事。小人没有远见，他们只是为了等陛下千秋之后，仓猝之间，援立他们平常所亲善的人罢了。唐朝自文宗以后，立嗣都出于左右之意，拥立者至有自称‘定策国老’，呼天子为‘门生天子’的人，此祸岂可胜言呢？！”

仁宗大感悟而说：“送到中书去！”

司马光到中书，看到宰相韩琦等，说：“诸位相公若不马上把议论决定下来，改天夜半，禁中送出条纸说以某人为皇太子，则天下谁也不敢违抗了。”

韩琦等连连称是，说：“敢不尽力！”月余之后，就选定赵宗实，明年立之为皇太子，赐名曙，即是后来的英宗皇帝。这是司马光做官后，首次参预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此事之后，仁宗对他颇为器重，不久任命他判检院（主持人民向君主投诉的机关）、权判国子监（临时代理中央大学校长），除

知制诰（圣旨撰稿人）。司马光坚辞八、九次，不肯受任视事，仁宗拗不过他，改任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予三品服饰，仍然主理谏院。自此司马光遂兼为天子侍臣兼讲臣，可以与皇帝经常直接接触与建议。

嘉祐八年（公元1063），皇帝派他主持该年的考试。同年，仁宗崩逝，太子曙继立，先帝遗赐价值百余万的珠宝黄金给他。他率领同僚三上奏章，力言国有大忧，财政窘，不可如此赏赐；如果因为是遗赐而不得推辞，请准许让侍从官以上，将之捐献出来，当作协助营建皇帝墓陵的费用。英宗否决所请。于是他把珠宝捐给谏院作为基金，把黄金送给舅家，义不藏于自家。

英宗即位后照例升迁有关官员。宦官任守忠也在升迁名单之内。司马光甚表反对，上言争论；他尤其反对升迁任守忠，他说：“守忠是大奸人。陛下为皇太子，并非出于守忠之意。这人沮坏大策，离间百端，幸好先帝不加听信；及至陛下即位后，他又依违摇摆，交构两宫，真是国之大贼，人之巨蠹，乞请将他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英宗于是将守忠外放，天下称快。

稍后，英宗升迁王广渊。司马光亦极言广渊奸邪，不可接近，说：“广渊在仁宗之世，私自结交于陛下，岂是忠臣的行为呢？希望贬黜，以厉天下的风气。”

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诏令将陕西二十万民兵，刺字改编为“义勇”军（宋朝当兵须刺字），故民情惊惶。司马光上疏极论其害，分析说“仁宗中期征集陕西人民为乡弓手，稍后将他们刺字为‘保捷指挥’（保捷是番号，指挥是军队建制单位），变成正规军；但人民蒙受损害，军队也终不能用，遇敌首先败北，常常造成全军崩溃的原因。县官知道他

们坐食无用，将之淘汰遣散，以复员为农；然而他们游惰惯了，不能返回农田，强者遂成为强盗，弱者辗转死去，父老们至今涕流伤心。现在的‘义勇’，与此有甚么不同？”奏章六上，均不采纳；要求罢官，也不获准。

其间，司马光曾以此道理质询宰相韩琦。韩琦说：“兵贵先声夺人，西夏正桀骜不服，突闻增兵二十万，岂不震慑收敛？！”

“所谓‘兵贵先声’，其实没有实质，只能欺敌于一日罢了。如今我虽增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西夏将会知道详情，到时他们还有甚么可怕的呢？”司马光追质道。

“君只是害怕‘保捷’军的历史重演罢了，”韩琦解释：“如今已经降下敕旨，与民约定，永远不将他们充军戍边啦！”

“朝廷曾经失信于民，人民实未敢相信此事，即使是我也不能不加怀疑！”司马光坚持说。

“有我在此，”韩琦有信心地说：“君何必担忧！”

司马光不同意：“相公长在此地当然无问题，异日他人当位，因相公所建立的现成之兵而用之，命令他们运粮、戍边，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罢了。”

韩琦闻言沉默，但也不改变主意。后来不十年，效果几乎与司马光的预测一样。司马光的国防构想，一向是主张不徵兵、不生事、维持现状的，所以连韩琦仅打算假装增兵来吓阻西夏的战略构想，他也力表反对。当然，这也与他一向不欺人、守信用的性格有关。

宋朝知识分子重名份、好议论之风，蔚成时尚，朝廷常常下诏戒群臣朋党；司马光中进士那仅是其中的一次，原因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名臣越职言事，故为宰相吕夷简所贬。司马光参与敏感的政治辩论，四十五岁以前

最显著的一次，就是建议仁宗选择宗室为太子之事，由于范镇因此而罢官，所以宰相大臣谁也不敢率先为言。司马光当面建议仁宗，仁宗大概感于他的诚意，所以不加贬黜。司马光敢言，宰相韩琦等就是透过他，选定英宗为皇位继承人的。英宗即位后，司马光也以继承问题为理由，斥责宦官任守忠为“大奸”、“大贼”、“巨蠹”，使守忠不但不能升官，而且改为外放。是则在时代风气影响下，加上他的性格使然，司马光也会很容易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

司马光精通历史，了解汉、唐以来，皇位继承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轻则造成横议党争，重则导至兵变国亡。所以在英宗即位初期，他就上言疏导皇帝，援引汉代君主不追尊本生父亲之例，希望英宗引以为戒。因为他预料英宗追尊生父之事，日后可能会发生，会引起重大纠纷。

果然，英宗即位后第二年（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震动北宋政坛的“濮议”终于发生。司马光时年四十七岁。此年，执政建言濮安懿王（英宗本生父）德盛位隆，应该特加尊礼。天子下诏召集太常礼院及两制官（在宫内及在中书撰写圣旨的机要官）讨论其事。执政欧阳修等主张不应该抹杀英宗与生父的父子关系，司马光见无人敢反对，独奋笔立议说：“过继给人做儿子（英宗过继给仁宗），不应再顾其私亲。今日要崇奉濮安懿王，理应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惯例，赠以高官大爵，极其尊荣就够了。”议案写成，将手稿留作存档，另誊一份上进。

当时，中外议论汹汹，御史吕海、范纯仁等六人意见同于司马光，皆上言力争，而相继降黜。司马光上疏挽救遭否决，遂要求与他们一同贬降。此案争论一年多，朝廷最后的决定，是尊称濮王为亲，表示与天子有父子关系。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逝，神宗继位，首将司马光由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擢升为翰林学士；稍后，王安石也升迁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必须极富文学，随时代皇帝写公文，故司马光力加推辞，神宗不许。

神宗面召司马光而开导他，说：“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只有董仲舒、杨雄兼而有之。卿有文学，为何推辞？”

司马光答：“臣不能写四六文（骈文）。”

“摹仿两汉制诏的方式（散文方式）也可以呀！”天子说。

“本朝的惯例不可以这样做。”光道。

神宗又问：“卿能主持进士考试，选取成绩优秀的人，而却说不能写四六，究竟是何原因？”

司马光不答而趋出。天子派遣内臣至阁门（龙图阁乃收藏宋太宗遗物的诸阁之一，设有学士、直学士等编制），强迫他接受任命状。司马光拜而不受，内臣催他入内谢皇恩，说：“圣上正坐着等你哩！”

司马光入至廷中，内臣将任命状塞进他怀中，不得已乃接受。

早在英宗崩逝前一年（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司马光四十八岁那年，英宗想研读古代历史，以帮助施政策划之用，遂命令他在崇文院设立史局修撰历史，准许他自选助手及运用各馆阁图书。神宗每开经筵，也常令他进讲历史。治平四年十月九日，司马光第一次进读所撰的历史，神宗遂面赐御序，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令继续修史的事业，寻任他为翰林侍读学士。

某日，司马光上疏论修心之要旨有三，此即：仁、明、武三字。又说“治国之要也有三，即官人（慎选官吏）、信赏

(有赏必行)与必罚(有罪必罚)。而且说：“臣从前为谏官，即以此六言献给仁宗，后来又献给英宗，现在献给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于此了。”所以神宗一度任他权知审官院(代理铨叙部部长)。

稍后，百官依照惯例给皇帝上尊号，刚好轮到司马光撰写答辞。他先上疏禀告神宗说：“先帝曾亲行祭天之礼，不接受群臣的尊号，天下莫不称颂他。从前汉文帝时，单于(匈奴元首的官称)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有听说文帝也取大名以和他比高下。希望陛下追念先帝的本意，不要接受尊号。”

神宗大悦，手诏回答：“不是卿，则朕不能听到这种言论。卿可善为答辞，使中外晓然知道朕的至诚，不是欺众邀名的人。”于是终身不再接受尊号。

二、新、旧党两巨擘——

王安石与司马光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秋七月，执政因河朔(黄河以北)大地震后，灾情颇重。国用不足，建议今年祭天大典后，不要依例赏赐两府(中书与枢密，一主文，一主武，均是执政机关，合称两府)；遂将此议送至学士院取旨(拟撰圣旨)。

司马光认为赏赐两府，不过花费二万而已，这些小数目节省下来，不足以救灾；应该改为两省(中书、门下两省)的文臣，宗室、刺史以上的武臣，均将赏赐减为半额就可以了。

当时司马光和学士王珪、王安石，共同入宫面圣取旨。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从贵近之臣开始推行，至于两府官员，不妨由他们随意推辞，不必下诏取消。”

王安石却道：“唐朝宰相常袞，曾经推辞赐饌。当时议论

以为常 既然自知不能，就该当辞位而不当辞禄。而且国用不足，不是当今的急务。”

“常 推辞赏赐，比那些既要禄赐又要权位的人贤多了。国用不足，真是当今的急务。”司马光反驳。

“非也，非也！”王安石再驳：“国用不足的原因，是因为未得善于理财的人。”

“善理财的人，不过是会刮敛民财的人罢了，”司马光针锋相对地说：“民穷而为盗，绝非国家之福！”

“不对，”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赋税不增加，而上用充足。”

“天下那有此理！”司马光似已气愤：“天地所生的资源有限，不在于民则在于官，譬如下雨，夏天多下雨而成灾，则秋天必然干旱。不增赋税而上用充足，不过是设法夺取人民的利益而已，害处更甚于加税；这是桑弘羊（汉朝理财专家）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司马迁）写了下来，用以表示武帝的不明罢了！到了武帝末年，盗贼蜂起，几乎酿出大乱，如果武帝不悔悟，昭帝（武帝子）不变法，则汉朝几乎灭亡。”

两人各引经据典，在御前争执不休。王珪这时进言说：“救灾节用，应自贵近之臣开始，司马光的说话对呀。但是赏赐所费无几，不赐恐伤国体，王安石的说法也对呀，只好请明主来裁定了。”

神宗闻言，也只好指示说：“朕意与司马光相同，但是不妨以不批准（取消两府赏赐）为辞而答覆他们。”

那天刚好轮到王安石撰写圣旨，他就引用常袞作例子来责备两府。两府接旨，也就不敢再推辞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财政构想不同，前者是资源有限论者，